

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體系的建構與思考

張堂錡*



臺灣與澳門在經濟、教育、交通、旅遊上關係密切，但文學卻是長期被忽視的一環。事實上，在澳門作家文學啟蒙與養成教育中，臺灣作家的作品對他們有很大的啟發、模倣與借鑑作用，特別是新詩與

小說，如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瓊瑤、郭良蕙、張大春、駱以軍等，還有如三毛、張曉風、龍應台等人的散文，也都是澳門青年作家成長的文學養份。然而有關這方面的交流、影響、轉化與對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本議題的提出，對於兩地區域文學研究的深化應有其深刻意義。

儘管這種交流與影響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亦即臺灣文學幾乎沒有受澳門的影響，但臺灣文學對澳門卻有明顯的“輸出”。即使如此，如果有系統地將澳門具代表性作家的文學養成與臺灣文學的關係聯繫起來，使臺灣／澳門之間的區域文學“關係史”或“交流史”研究得到進一步的釐清與提昇，相信不論對建立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學術體系、對臺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還是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探討，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 張堂錡（1962-），臺灣新竹人。臺灣師大國文系、所畢業，東吳大學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撰、專刊組組長，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政大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曾獲中興文藝獎章（2000年）、中國文藝獎章（2012年）；早期以創作小說、散文為主，代表作有《讓花開在妳窗前》、《舊時月色》等；近期以文學評論為主，集中於中國現代文學、臺灣散文、報導文學及澳門文學等幾個領域，著有《黃遵憲的詩歌世界》、《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個人的聲音：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百年回望》等十餘種；編寫《現代小說概論》、《中國現代文學概論》、《大陸當代文學概論》等書。

前言

從過去的文化沙漠到今日的文化綠洲，澳門文學自80年代以來歷經近三十年的“新文學運動”，其發聲的力度與廣度與日俱增，文學的主體性格日益鮮明，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版圖上，澳門文學不再是可以缺席的一塊拼圖。筆者於2002年5月為《文訊》雜誌策劃製作的“發現澳門文學”專輯中曾指出：“澳門不是文化沙漠，不是文化碼頭，也不祇是文化橋樑，而是擁有自己獨立地位、自主面貌且形象日益鮮明的豐饒之島、文化之城。對澳門文學的表現，要不要尊敬是個人的自由，但值不值得尊敬卻不是‘自由’可以任意打發的。不論從文學作品的審美判斷，還是文藝思潮的軌跡追索，文學運動的多元觀察，我必須說，時至今日，對澳門文學有意或無意的忽視，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會是自身文學開展、格局與視界的一種損失。”⁽¹⁾ 隨着澳門文學近十幾年來作家作品的增加與累積，這樣的看法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不必諱言，80年代中期以前的澳門文學是貧瘠乏力的，它的邊緣與滯後，和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蓬勃的華文文學發展相比，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但80年代中期以後，它就如一匹奮步直追的快馬，成長速度與進步幅度都令人驚訝，這種改變使得世界華文文壇再也不能對它“視若無睹”。澳門作家出色的文學表現來自他們多元的文學啟蒙與養成教育，在啟蒙及養成教育過程中，除了西方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五四作家作品的影響，臺灣作家的作品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啟發、模倣與借鑑作用，特別是新詩與小說，如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瓊瑤、郭良蕙、張大春、駱以軍等，還有如三毛、張曉風、龍應台、李敖等人的散文，也都是澳門青年作家成長的文學養份。然而有關這方面的交流、影響、轉化與對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殊為可惜。

澳門文學研究的重要性

在談澳門文學之前，必須先談“澳門學”。所謂“澳門學”，澳門大學教授郝雨凡的說法可供參考。他說：“澳門學可以概括為，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效應的綜合性學科。”⁽²⁾ “澳門學”概念的出現雖然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但其學科建設一直處於初始、業餘、邊緣的狀態，而且其“緣起和聚焦點是歷史”⁽³⁾，不在文學，這祇要從2010年4月於澳門大學舉辦的“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所出版的論文集可以窺見，在四十篇論文中祇有朱壽桐教授一篇談的是澳門文學。對此，朱壽桐分析說：“澳門學一般偏重於澳門歷史、經濟、社會以及相關典籍的研究，似乎與文學關係不大。”但他不認為這是正常現象，他強調：“一種學問必然將其所覆蓋的文化寓涵於其中，而文學是文化的集中表現，如果澳門學的當然內容必然包含澳門文化，則作為澳門文化集中體現的澳門文學也應是澳門學的當然內容。”⁽⁴⁾ 換言之，在澳門學的研究視域中，澳門文學絕非可有可無的一支，相反的，它是不可或缺也是具典型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澳門文學研究的重要性，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兩點：

一、殖民／後殖民研究的另類範本⁽⁵⁾

1) 出走與回歸：鮮明的殖(移)民色彩

16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人開始入據澳門，1887年葡萄牙與清政府簽訂《和好通商條約》後，展開對澳門一百多年的實質殖民管治，使葡國文化對澳門生活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從日常飲食、習俗、語言到宗教、建築，都可看到與中華傳統文化迥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和型態。步行在澳門街頭，隨處可見西方的天主教堂、葡人居住的歐式房舍、葡國餐廳、教會學校，使澳門宛如里斯本的縮影。著名的大三巴牌坊，紀念16世紀葡國重要詩人賈梅士的白鴿巢公園，還有議事

亭前地一帶鋪設黑白碎石地面，並砌成波浪形圖案，也是典型的南歐風味，甚至於風行一時的葡式蛋撻，或是處處可見諸如“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賈伯樂提督街”、“約翰四世大馬路”等街道名稱，無不充滿着以葡國為主的歐陸特色，殖民的痕跡在澳門可說是深深烙下。

從小漁村到現代都會，四個多世紀以來，澳門人口主要是由移民組成，來自歐、亞其他國家，特別是葡國，但主要仍是華人。以2003年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澳門總人口中，華人佔96%以上，葡萄牙及土生葡人佔2.5%，這樣的人口比例基本上從以前至今沒有太大變動過。根據《澳門縱談》一書的分析，華人主要有三類：居澳兩代以上的華人、世界各地的歸僑、1979年以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第一類約佔總人口7%，第二類約佔10%，最後一類則佔人口的最大比例，語言與地緣關係，又以廣東人為大宗，但上海人、福建人也有一定比例。⁽⁶⁾可以說，澳門基本上是個移民社會，不同文化背景的衝擊交融，自然會給文學作品帶來多文化、跨文化色彩。

移民是個世界性的話題，幾乎每個民族都有屬於自身或放逐、或流浪、或融合、或重生的集體記憶，歷史與地理的因素使然，移民書寫成為澳門文學的重要母題，不論是刻劃適應與奮鬥的生存現實，非法偷渡的身份焦慮，還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經歷，題材豐富且表現深刻，和香港一樣，這類作品是澳門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特殊產物。舉例來看，廖子馨獲得第二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首獎的〈命運——澳門故事〉，就是一篇移民題材作品，寫內地大專女生沈巧放棄所愛的故鄉男友，在1989年與其他二十多位勞工一起過關開到澳門來工作，最終獲得澳門身份證的故事。當1995年中秋節前一天，澳督證實將為三萬多名持臨逗證者發給澳門身份證時，沈巧也首肯了在澳門相戀的阿偉的求婚。故事沒有太大的高潮起伏，但有現實的說服力，是富時代感的典型澳門故事。

殖民與移民，都給人漂浮、流動、無根之感。黃文輝所發出的感嘆：“我的叔公當年是馬來西亞的新移民，我當年是澳門的新移民，那麼，我的下一輩呢？”⁽⁷⁾語氣中滿是無奈的茫然。詩人懿靈更以“流動島”的形象概括澳門人驛動的心與不安的命運。當然，這樣的身份認同焦慮與流離情緒，在回歸之後，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與釋放。不過，應該強調的是，祇有自身文化的真正確立，才是擺脫殖民主義控制的開始，也才能真正獲得自己的新生。在出走與回歸之間，殖民與移民所留下的軌跡、影響，已然成為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成份，而澳門文學中所反映、紀錄、描述的種種痕跡與色彩，也已經成為全球性後殖民研究風潮中另類而可貴的範本。

2) 看與被看：珍貴的土生文學

在澳門殖民歷史上，土生及其文學可說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葡文 *Macaense* (土生人) 的直譯其實就是“澳門人”。然而，回歸對澳門土生而言，卻是個尷尬的時刻。不論返回葡國或留在澳門，他們都像是被遺忘的一群。長久以來，因為華人與葡人的涇渭分明，夾身其中如“三明治人”的土生，始終有着強烈的身份認同焦慮。土生詩人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未來〉中的“澳門的未來……將會怎樣？／中國人的未來？／葡國人的未來？／那些生長在澳門／葡萄牙的兒子們的未來？”⁽⁸⁾道盡了他們心裡的疑惑與悲哀。回歸之後，他們一部分返回了葡國。有趣的是，當他們逐漸離去之時，土生的處境及其文學似乎才開始真正被看見和看重。

土生文化是中西不同文化交融的典型，土生文學則是這種交融的特殊產物。香港殖民時期的相對短暫，沒有條件形成類似土生的族群，所以數量不多的澳門土生文學顯得彌足珍貴。20世紀以前，澳門土生文學極少，1940年代開始，陸續出現一批土生作家，他們以葡文創作、出版了一批文學作品，其中具代表性的詩集有李安樂的《孤獨之路》，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的



《澳門，受祝福的花園》，馬若龍的《一日中的四季》；小說集有飛歷奇的長篇《愛情與小腳趾》、《大辮子的誘惑》、短篇〈南灣〉，江蓮達的短篇〈長衫〉；回憶錄性質的散文有愛蒂斯·喬治·瑪爾丁妮的《廢墟中的風——回憶澳門的童年》；劇本有飛文基的《見總統》、《華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從這些作品來看，他們對澳門這塊土地是很認同的，自稱“澳門之子”的土生，心繫澳門的感情是令人動容的。

在土生文學作品中，有許多“凝視”澳門之作，不論是人情世態，還是自然風光，都給人嶄新的視域，新鮮的閱讀經驗，而且細加體會，其中有很多文化的深刻性與典型性，都是華人作品中所欠缺的。在葡人、土生的身影漸漸遠去的時刻，以文學為他們曾經走過的坎坷人生塑像，是澳門作家可以做也應該做的功課。澳門文學也必將因此而更精彩，讓更多人“看見”。

二、消費文化研究的特殊範本

1) 快餐文化與框框文體：澳門副刊的特色與局限

澳門文學的起飛是和澳門社會經濟的起飛同步發生的。商業消費體系的日漸活絡，對文學、文化、藝術的活絡產生了客觀條件的促進作用。文學書籍的出版、文學活動的舉辦、社團的持續運作、閱讀人口的培養等，都有賴於經濟條件的配合。澳門文學不管是1960、1970年代的慘澹經營，還是1980年代的大放異彩，作為澳門最具代表性的報刊《澳門日報》可以說是扮演着關鍵的角色。凡在澳門有一點名氣的作家，沒有不和這間發行超過半世紀的報社有着或深或淺的關係。先在《澳門日報》副刊上寫專欄，累積一定字數後由《澳門日報》出版社出書，幾乎成了澳門作家走上文壇的模式。黃文輝甚至說“澳門文學就是副刊文學”，因為“目前被稱為文學作品的澳門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實是報紙副刊作品結集而成，特別是散文，恕我孤陋寡聞，還數不出有哪一本澳門作家的散文集不屬此類”。⁽⁹⁾ 澳門文

學確實是以報紙副刊為主要園地發展起來的，不誇張地說，沒有《澳門日報》副刊，就沒有澳門文學今日的繁榮。這和其他華人地區眾多傳媒競爭發展的型態有很大不同，《澳門日報》的一枝獨秀成了小城文學環境的一個特殊表徵。

澳門副刊受香港副刊的影響，版面編排以短文專欄為主體，也就是俗稱的“框框文體”。陶里在概說澳門文學時就提到：“報紙散文，字數限在五百至一千之間，超出一千字，編者就較難處理。”⁽¹⁰⁾ 這就導致澳門文學以散文隨筆為大宗的現象。為迎合讀者口味，走輕薄短小的路線，形成淺碟式的快餐文化。這也是澳門文學的一個特殊性。格局與視野，很難在這些零碎、短小的作品中有大氣的展現，取而代之的是輕鬆說掌故、笑談生活事的或雋永、或幽默、或諷刺、或抒情的專欄小品。“框框文體”的流行，拉近了與市民讀者的距離，推動了文學的廣度發展，但同時也局限了文學的深度。林中英長期在副刊實際從事編務工作，對於“專欄散文”的缺失有中肯的批評：“專欄可說是雙面刃，它能使散文作品因循地生產（其中包括劣質品），它令散文擴大影響力的同時，也忽略了文學的色彩。要澳門散文創作水準提昇，作者們先需克服滿足於小方塊寫作的慣性與惰性。”⁽¹¹⁾ 這說明了專欄散文過度的功利適用性，是它的利器，也是它的不足。

副刊上數量龐大的框框隨筆，初步建立了澳門文學的形象與印象，雖說參差不一，但披沙撿金，還是有不少出色力作，或啟發人心、幽默人生，或嬉笑怒罵，文淺意深，題材上描繪澳門風情、討論澳門事務、介紹澳門文化、記錄澳門人情，加上適度運用澳門粵語詞彙和廣東語法，使澳門文學的“澳門性”得以生動保留和彰顯。

2) 金光大道上的蓮花：澳門博彩業的衝擊與反思

要談澳門的消費文化，就不能不提博彩業。這在澳門是歷史悠久、合法經營的特殊行業。1847年澳葡當局公佈法令，由政府開投，賭



商專營賭業，其後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澳門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大西洋城、摩納哥的蒙特卡羅合稱為世界四大賭城。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其產出從1990年68.65億元增至1999年120.03億元，佔GDP比重達四分之一以上，佔整體旅遊收益三分之二以上。博彩稅收從1990年19.36億元增至1999年38.17億元，佔政府財政收入近半數以上，2003年更超越100億元，佔政府財政收入高達75%。⁽¹²⁾ 澳門回歸後，決定逐步開放賭權，放棄獨家專營，2002年宣佈將博彩業批給澳門博彩公司、永利度假村公司、銀河娛樂場公司等三家，至此，一家獨營澳門賭業的時代宣告結束，迎來的是一個更具規模、更加競爭的賭業戰國時代。

澳門“賭城”的形象原本就已十分鮮明，回歸之後更加“穩固”。在這彈丸之地的蕞爾小島上，竟然林立着至少三十家大型的“娛樂場”，從葡京、皇家到星際，從金沙、威尼斯人到新濠天地，一條金光大道已然成形，大道上的光芒也正在映射、撞擊、改變著澳門社會、文化與澳門人的生活與心理。面對如此強烈的衝擊，我們不禁要問：在熱鬧繁華的背後，澳門社會面臨的是危機還是契機？在金光四射的消費娛樂環境中，澳門這座小城的象徵標誌——蓮花，其存在與綻放能否“出淤泥而不染”？澳門的詩歌、澳門的文學在這樣的土壤中生根、發展，能否給人美好的“蓮的聯想”呢？蓮花不管是開在“文化沙漠”抑或“金光大道”上，都是一種艱難得近乎奇蹟的現象。正是這樣的現實環境、生活型態與文化氛圍，澳門文學的蓮花品格，因而特別值得人們尊敬，同時也特別需要人們的理解與關注。

澳門本地作家對博彩業基本上採取一種視若無睹的姿態，甚至連冷眼旁觀的思考都不願，這與一貫重視道德教化、強調社會性、倫理性的澳門文化特質有關。在處理有關博彩題材的作品時，澳門作家多半會從賭業的危害社會、腐蝕人心角度入手，揭示其紙醉金迷背景下錢與性的

糾葛，人性的墮落與黑暗。從澳門特殊的環境考量，這樣的立場雖然和資本市場巨獸根本無法抗衡，但卻是有其必要。祇是文學的無力感，在兩相對照下更顯孤單與弱態。酒樓、當舖、色情、桑拿、娛樂場，燈紅酒綠，對許多作家而言，反而讓人有置身於無邊荒原的冷漠、孤寂感，認為那彷彿是廢墟上的一場春夢，灰燼裡的一點餘光。和五光十色的娛樂事業相比，文學邊緣、弱勢、冷清的地位，使作家們堅持的姿態總帶有一些悲劇英雄的色彩。從作家創作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其它地區欠缺的題材，也是澳門作家可以着力之處，儘管目前這類題材作品的質量都有待提昇，但在詩、散文、小說方面仍有一些不錯的作品，特別是題材容納量大的小說，對賭業與人性的刻劃頗有可觀之處，值得進一步重視與研究。

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必要性

身為一位對澳門文學長期關心與觀察的臺灣學者，如何將二者之間進行學術性的參照與聯結，是筆者一直思考的議題。從關係史／交流史的視角切入，是筆者覺得頗有可為且頗具意義的嘗試。

臺灣關心澳門文學的人很少，對澳門文學直接、整體研究的專書也至今未見。不過，至少已經有了一篇由澳門僑生余少君撰寫的碩士論文《80年代以降澳門後現代詩研究：以韋鳴與懿靈詩為例》（2007年東華大學中文研究所，須文蔚指導）。須文蔚也發表了一篇〈澳門詩人韋鳴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東華中文學報》第17期，2010年7月）。能有新的研究人力加入，實在是令人欣慰的發展。詩人向明曾經參與澳門的文學獎評審工作，也零星寫了一些評論澳門詩人作品的文章，如〈回聲不會啞啞——讀姚風的《遠方之歌》〉（《人間福報》，2007年4月7日，第15版）等。林明德教授曾於1997年在臺灣出版《澳門的區聯文化》（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一書，主要是介紹古蹟、文化、風俗等方面，算是早期的澳門研究成果。單篇論文



方面，據查臺灣國家圖書館的期刊文章索引，雖有澳門現代文學方面相關文章十七篇，但除了新增須文蔚、余少君及筆者三篇論文，其它收錄的正是筆者為《文訊》雜誌所策劃的五篇文章，除了筆者，撰文者均為澳門作家或學者。⁽¹³⁾ 另外還有幾篇資料，但不在臺灣發表。整體來說，這樣的研究人力與成果祇能用“冷清”來形容。

大陸上因1999年回歸熱潮而做出了一些成果，但熱潮一過，又恢復先前的冷淡與平靜。

“臺港澳文學”常常變成“臺港文學”，澳門文學成了尷尬的缺席者。至於澳門學者，多為業餘的批評者，而且少有主力置於澳門文學，導致澳門文學的研究缺乏系統性與完整性。澳門大學的中文系課程或通識課程也不把“澳門文學”視為學科加以討論或介紹，似乎澳門文學的創作成果至今仍未獲當地學者在學術上的肯定和接納，其中牽涉的主客觀原因很複雜，但筆者相信，一如香港的大學對香港本地文學、文化、歷史的重視並開設相關多種課程，澳門文學的學科化祇是遲早的事。

臺灣與澳門在經濟、教育、交通、旅遊上關係密切，但文學卻是長期被忽視的一環。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長期任教的李德超博士。他生於澳門，曾就讀澳門德明中學，1973年在香港的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以《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獲得碩士學位，這應該是有關澳門文學的第一部學位論文。⁽¹⁴⁾ 1982年他以《澳門三巴寺研究》獲得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他先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然後到韓國全北大學客座，最終來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任教，出版了多部研究專著，並指導了許多文化大學的研究生。⁽¹⁵⁾ 儘管他後來研究的主力是古典詩歌，但他對澳門文學歷史的研究卻並未中止。⁽¹⁶⁾ 對於這位澳門文學的先行研究者，我們的關注實在遠遠不夠。當然，像李德超這樣的例子並不多，他受到臺灣文學的影響也遠不及中國文學的影響。然而，事實上，不

論中年一代還是新生代澳門作家，都曾直接間接地受到臺灣文學的影響與啟發。自1949年以來，許多澳門僑生來臺昇學，返回澳門後擔任中學教師，推廣文學教育，其中必然有許多關於臺灣文學的介紹，影響了一代青年作家對臺灣文學的接受與喜愛，進而模倣、轉化、創作，寫出屬於澳門自身的文學。這樣的長期交流關係，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與研究。本議題的提出，對於兩地區域文學研究的深化應有其深刻意義。

澳門學界和文壇對臺灣文學的一定認識與興趣，從他們舉辦關於臺灣作家作品的學術會議也可略窺一二。舉例來說，澳門大學中文系於2008年5月舉辦“第二屆當代詩學論壇”，臺灣詩人、學者張默、李瑞騰、簡政珍應邀參加，在該次會議上，朱壽桐提出了舉辦“漢語新文學講堂”的構想，並落實於2010年11月舉辦的“洛夫詩歌研討會”，韋鳴、姚風等人參加，洛夫親自出席，並講述自身六十年來的詩歌創作經歷，頗獲好評；接着，2011年11月又舉辦“葉維廉與漢語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洛夫與臺灣大學的柯慶明、成功大學的翁文嫻應邀出席。如果往前追溯，澳門大學曾於2007年4月27日邀請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作了“詩與音樂”的專題演講，引起轟動。類似的活動，可以看出澳門對臺灣文學(特別是臺灣詩歌)的重視與交往關係。

儘管這種交流與影響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亦即臺灣文學幾乎沒有受澳門的影響，但臺灣文學對澳門卻有明顯的“輸出”。即使如此，如果有系統地將澳門具代表性作家的文學養成與臺灣文學的關係聯繫起來，使臺灣／澳門之間的區域文學“關係史”或“交流史”研究得到進一步的釐清與提昇，相信不論對建立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學術體系、對臺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還是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探討，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以下四點，就是筆者認為這個研究體系如果建構起來將會產生的學術意義與文學價值：

一、建立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學術體系

對於臺灣文學與澳門文學交流、比較、影響等“關係史”的研究，是學界尚未觸及的學術議題，本議題的提出將可以活絡及深化兩地文學的學術發展，如能將此一學術體系建立起來，應該可以填補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某些隙縫與空白。這個學術構想本身的提出，有其持續發展的開創性與前瞻性，對兩地文學研究將是一個具“戰略眼光”的學術生長點。

二、對臺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具有一定的助益

近年來臺灣文學研究重視“東亞視野”，過去與香港文學之間也有較多的互動，但對澳門的認識卻十分有限。透過文學的中介，將可以打開學術視野，深度認識澳門。透過認識澳門，反過來也可以更加認識自己。開放的臺灣視野，是臺灣文學走向世界必備的條件之一。

三、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探討可以提供一個生動的參照系

長期被忽略的澳門文學，其實擁有十分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作為東西文化交會的橋樑，它保存了大量的中華文化與傳統習俗，同時又開放接受了外國不同文化的洗禮，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生態，和東南亞其它國家的華文文學有相近也有相異之處，值得比較參照。

四、對澳門當地文學(或文學評論)的發展將會產生刺激作用與推動力量

澳門文壇與學界，相對來說比較平靜，對於將澳門文學向外發聲的努力，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不免有些保守。近幾年來，透過研討會與文學獎的舉行逐漸顯現其活力，但對外的聯繫仍嫌不足。如果有臺灣學者對澳門文學進行研究，相信可以鼓舞或刺激當地學者正視自身文學的成就，進而更有規模、有計劃地投入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中。

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可行性 以臺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為例

在“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的學術構想中，值得開發的議題有：澳門報紙或刊物中有無臺灣作家的專欄、作品？澳門文學中有多少涉及臺灣題材的作品？澳門作家的文學養成中受到哪些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的啟發？澳門文學論文中有多少處理臺灣文學的相關議題？⁽¹⁷⁾ 澳門作家在臺灣發表與出版作品的蒐羅整理⁽¹⁸⁾；臺灣作家參與澳門文學活動的記錄⁽¹⁹⁾；多少中學教師在臺灣受大學教育返澳從事文學教育？以及臺灣文學與澳門文學的比較研究、現代主義在臺灣／澳門文學的創作影響與藝術表現等等。這些“乏人問津”的問題，實在不該繼續“視若無睹”下去。目前所見，有關上述議題的討論很少，即使偶有提及，也是一語帶過，缺乏進一步的論述與發揮。

以臺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為例，所見多為“吉光片羽”式的描述，缺乏全面而系統的探討。當然，這些零星片段的材料還是彌足珍貴的。如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提到：“在部分學校裡，由於教師的影響，臺灣作家的作品對於文學青年的影響不小。他們讀白先勇、余光中、三毛、瓊瑤、張秀亞、痲弦、楊牧、於梨華、李黎等海外、臺灣作家的作品。”⁽²⁰⁾ 又如李觀鼎〈論澳門現代詩歌批評〉中簡單提到“懿靈深受臺灣後現代詩論的影響”⁽²¹⁾；還有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在分析澳門的新詩創作時指出：“澳門的新詩主要是繼承中國新詩的風貌而發展起來的。但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新詩，成為宣傳或詮釋政治的工具，與五四至40年代的中國新詩，出現了斷層，澳門詩人唯有向臺灣和香港華文詩汲取精華以豐富自己，於是出現80年代蓬勃的現代詩創作。”⁽²²⁾ 由此可以略窺臺灣作家作品在澳門的流傳方式與深刻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集作家、編輯與學者於一身的廖子馨，她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一書中，



仔細梳理了澳門女性作家在詩歌、小說、散文方面的表現與創作特色，其中一節處理了臺灣女性文學對澳門女性文學的影響。她指出：“60年代臺灣出現以瓊瑤作品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創作，在70年代對澳門女作家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並具體地比較了周桐的小說與瓊瑤、郭良蕙小說的異同，認為“言情”的創作特點正是瓊瑤、郭良蕙作品對她潛移默化的影響，而“瓊瑤‘迷信愛’和‘美化人生’的創作意識形態，與澳門女作家的情感具有相通之處”⁽²³⁾。她對當時澳門文壇創作傾向顯然有相當客觀的掌握與觀察，她分析道：“其時澳門以‘左’的文學創作為主導，而社會上分派‘左’‘右’兩個陣容，進步學校推崇大陸進步文學書籍，但部分親臺灣的教會學校則宣揚臺灣文學；以言情為創作特色的郭良蕙和瓊瑤作品，便與冰心、丁玲的作品同時在澳門流行。由此，進入不同性質學校接受教育的作家，在創作意向的選擇上多少受到不同的影響。”⁽²⁴⁾廖子馨還將臺灣與澳門的女性文學創作特色加以比較，提出許多具獨到性的見解。儘管在抽樣與篇幅上稍顯薄弱，但已經是較早且較有系統地將兩地文學進行學術化的討論，學術開拓的功勞不容忽視。

如上所述，臺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落實到具體作家作品的交流互動，據筆者初步的整理至少有：如2000年以前，曾長期任教澳門大學中文系的詩人鄭煒明（筆名葦鳴），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期間，曾擔任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執行委員兼澳門分會會長⁽²⁵⁾，協助策劃有關澳門文學的專輯在《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發表，並因此和臺灣文壇建立了一定的關係；他執教澳大中文系期間，講授“現當代作品選讀”等課程，大量介紹了包括余光中、洛夫、鄭愁予、葉維廉、張默、痲弦等人的詩作。又如長期負責《華僑報》副刊編務的專欄作家凌稜，她喜歡閱讀李敖的作品；澳門詩壇名宿陶里，早年寫詩即受到余光中、楊牧詩作的啟發，曾在《澳門日

報·新園地》副刊上闢有專欄“現代詩導讀”，其中有一篇〈非理性化——周夢蝶〈樹〉〉就是有關臺灣新詩的介紹；在《澳門日報》副刊同事多年的作家林中英、廖子馨，都曾在文章中毫不掩飾她們對三毛的喜愛；周桐的小說受瓊瑤、郭良蕙的影響，已如上述；專欄作家區仲桃的博士論文研究臺灣現代詩，余光中的《白玉苦瓜》、洛夫的《石室之死亡》、鄭愁予的《雪的可能》等詩集，對她的寫作和研究產生過極大的吸引力；洛夫的詩，同樣也對年輕詩人馮傾城踏上新詩創作有着啟蒙般的作用，特別是在古典意象經營方面；而另一位年輕詩人呂志鵬則是在洛夫詩歌的現代形式與意象上多所借鑑（他同時也深愛羅門、管管的詩作）；年輕小說家寂然，以其技巧多變為澳門小說帶來新鮮的題材與形式，這裡面有着張大春、駱以軍的作品對他在小說觀念與技巧上的啟發與示範作用；臺灣的後現代詩對同樣有着後現代詩風的懿靈產生鮮明的影響，這已經是論者的共識。政大新聞系畢業的李展鵬，在副刊上有關電影評論的專欄甚受好評，不能否認，臺灣教育的養成與文學、電影都給了他極大的養份。

以上這些澳門作家對臺灣文學接觸、接受、模倣或借鑑的實例，有的是由他們的受訪文章中提及，有的則是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與呈現，更大規模的訪查梳理已由筆者透過國科會專題計劃在陸續進行中，理想的情況將會是透過實際作品的比對和作家的自述，進行細緻的整理與分析，使此一對臺灣／澳門兩地文學發展、研究均有積極助益的議題，可以發揮填補兩地文學關係史學術研究空白的的作用。

結語

長久以來，臺灣／澳門文學交流的現象，給人“單行道”的印象，但仔細清理，還是發現了一些澳門作家在臺灣的文學活動，這說明了兩地文學確實存在着“有來有往”的交流事實。

一、澳門作家在臺灣的得獎紀錄：包括韋鳴曾獲1994年臺灣著名詩刊《創世紀》的“詩創作大獎”；曾經在臺灣讀書的陳達昇則於1990年獲得《中華日報》主辦的梁實秋文學獎詩歌翻譯類的首獎，1991年並獲得年度優秀青年詩人獎；馮剛毅曾於1994年獲臺灣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的第35屆“海外文藝工作獎”，而馮傾城則於2006年獲臺灣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的第47屆“海外文藝創作獎”。

二、澳門作家作品在臺灣的發表與出版：從1988年起，澳門作家在臺灣文學刊物上開始有作品發表。首先是1988年9月由符兆祥主編的《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18期策劃了“澳門新詩專輯”，收有玉文、江思揚、高戈、陶里、淘空了、莊文永、梯亞、韋鳴、馮剛毅、懿靈等二十五位澳門詩人的詩作八十二首，這應該是澳門新詩在臺灣集體亮相最早也最完整的一次了。1993年9月，符兆祥在《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第38期又策劃了“澳門青年詩人小輯”，收有心硯、王和、林玉鳳、黃文輝、區仲桃、郭頌陽、馮傾城、齊思等八人的十三首詩；韋鳴的詩作〈致坦克、軍車輪下的詩人〉收於余光中主編的《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臺北：正中書局，1989）；懿靈的詩〈我們遺失了所有的臉〉、〈進化狂想曲〉等四首，先是於1990年7月發表在由向明主編的《藍星詩刊》第24號上，後來又被收入向明編選的《七十九年詩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91）；1994年9月，由簡政珍編的《創世紀》詩刊第100期，設有“創世紀四十年詩創作獎特輯”，韋鳴的詩〈祭〉、〈述懷三語〉、〈不是〉獲獎入選，向明寫了〈韋鳴小評〉，此文後來又發表於1994年12月的《澳門現代詩刊》第7期。當然，更具意義的應該是年輕詩人袁紹珊的詩集《Wonderland》於2011年由臺灣的遠景出版公司出版。這是澳門作家第一次在臺灣出版文學書籍，可以說在兩地文學交流史上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以上這些是目前筆者所能搜見的相關資料，數量不多，但有着筆路藍縷的文學史價值。相信在更詳細的清查蒐集後，應該還會有更豐富的資料可以見證兩地文學的交流往來，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未來甚至可以與澳門學者作家跨區域合作編寫《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叢書。這絕非“突發奇想”，而是筆者思考、耕耘多年的學術工程構想，其開創性與重要性固然已經開始為學界所注意，但其艱難性與複雜性也同樣顯而易見。

【本文為100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臺灣／澳門文學關係史(一)：臺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研究(1949-2010)”之部分成果，計劃編號NSC 100-2410-H-004-172-MY2，謹此致謝。】

【註】

- (1) 張堂錫：〈邊緣發聲——澳門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文訊》2002年5月號，頁35。
- (2) 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代前言），《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郝雨凡等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2。
- (3) 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前揭書，頁8。
- (4) 朱壽桐，〈澳門學視域下的澳門文學〉，前揭書，頁85。
- (5) 在朱壽桐主編的《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一書中，對於後殖民主義理論運用於澳門文學的探索，認為“非常符合當下話語的潮流”，但因澳門受殖民統治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所以該書強調應該要謹慎運用：“澳門的情況似乎並不完全符合後殖民主義的特徵。澳門雖然受葡萄牙殖民當局的統治，軍事、政治上都遭受其控制，但在文化上卻沒能生成一個為葡國政府服務的葡國文學創作傳統。……在這塊土地上，華人仍佔96%，他們所使用的口語和書面語仍是漢語。漢語仍是所有華人使用的母語，葡萄牙在其殖民地的果阿、文萊和巴西都能推廣葡語，但在澳門卻行不通。”不論語言或思想控制，葡國的殖民政策基本上是失敗的。但是，澳門畢竟受其殖民統治過，也的確受其文化的滲透影響，這和未受殖民統治的地區還是有區別的。所以，該書的結論是：“在討論、研究澳門的文學或者文化的時候可以用後殖民理論闡述，但應該謹慎處之。”

- 筆者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有關殖民／後殖民理論的運用確實可以放在澳門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上，則是無庸置疑的。該書的說法見頁42-43。
- (6) 引自孫靜：〈漫談澳門文學的特色問題〉，《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程祥徽、鄭煒明主編，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頁574-575。
 - (7) 黃文輝：〈移民〉，《不要怕，我抒情罷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年），頁10。
 - (8) 引自饒芃子、莫嘉麗等著：《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217。
 - (9) 黃文輝：〈胡悅胡閱——兼論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的關係〉，《字裡行間——澳門文學閱讀記》（澳門日報出版社，2005年），頁51。
 - (10) 陶里：《澳門文學叢書·概說》（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頁4。
 - (11) 林中英：〈託身大眾傳媒的澳門散文〉，《澳門日報》副刊《鏡海》版，2000年2月16日。
 - (12) 相關數據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出版，2005），頁318-319。
 - (13) 新增的三篇除了須文蔚外，余少君的〈試論陶里的澳門地誌詩書寫〉發表於《華文文學與文化》創刊號，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2011年12月；張堂錡的〈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第17期，2010年6月。2002年為臺灣《文訊》雜誌策劃的五篇文章分別是：張堂錡〈邊緣發聲——澳門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廖子馨〈澳門文學的歷史性與獨特性〉、湯梅笑〈澳門文學與《澳門日報》〉、鄒家禮〈澳門筆會與“澳門筆匯”〉、鄒家禮〈澳門文學刊物出版概況〉。
 - (14) 這部碩士論文共分五章：第1章“導言”，第2章“澳門之史地概述”，第3章“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第4章“澳門現代文學之概況”，第5章“後記”。“後記”不算，實際祇有四章，主體為第3章，分成四小節：甲、在澳門拓展中國文學之文人，乙、寓居澳門之文士及其著作，丙、澳門之石刻，丁、中國文士在澳門之寫作特徵。
 - (15) 李德超在臺灣出版有：《詩學新編》（五南出版公司，1995）、《風木樓詩聯稿》（里仁書局，1997年）、《嶺南詩史稿》（基隆：法嚴寺出版社，1998年）等書。他不幸於2008年9月於臺北過世，時為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 (16) 例如他在臺灣曾經發表過〈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皮藏之澳門檔案舉隅〉等論文，對臺灣與澳門之交流關係研究自有其不容忽視的貢獻。
 - (17) 以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的區仲桃為例，她雖是香港人，但於1989年來澳門讀大學，赴美攻讀碩士學位後，於1995年選擇回母校澳門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應《澳門日報》副刊的邀請，成為“美麗街”專欄中的一員，每星期撰寫文章。後來於2004年在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希臘點點星集》一書。她在香港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主題為臺灣現代詩，主要以余光中、洛夫、羅門、蓉子、鄭愁予五位被她稱為“被放逐詩人”的作品為對象。在2012年5月5日臺灣東華大學舉辦的“第五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她發表了〈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破碎夢想：試論澳門及澳門現代主義詩中失敗的殖民地意識形態〉。此外，她還曾經發表過一些和臺灣現代詩有關的論文如〈記憶的詩學：論臺灣現代主義詩歌中的“虛構記憶”〉、〈張冠李戴：論“中國勃朗寧夫婦”羅門、蓉子的詩歌特色〉、〈想像台北：論羅門詩中的城市書寫〉等。
 - (18) 澳門作家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袁紹珊的詩集《Wonderland》，由遠景出版公司於2011年出版。書中“和諧之地”收錄了與北京和臺北相關的詩作，特別是〈靈光的臺北〉一詩，直接描寫了對台北的觀察與體驗。詩集由羅智成寫序，又有《聯合報》繽紛版主編林德俊的推薦語，可見她和臺灣文學的密切關係。
 - (19) 例如詩人向明、評論家李瑞騰及筆者都曾經擔任過由澳門筆會、澳門基金會主辦的澳門文學獎評審；筆者也曾於2012年2月4日擔任臺北國際書展的澳門館的座談會演講人，與澳門作家廖子馨、李展鵬共同座談主題“金光大道上的蓮花——你所不知道的澳門文學”等。
 - (20) 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寫於1986年，刊載於《澳門文學論集》（蘆荻、李成俊等著，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年）頁175-176。
 - (21)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詩歌批評〉，原發表於2000年“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後收錄於其《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頁125。
 - (22) 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頁125。
 - (23) 廖子馨，《論澳門女性現代文學》（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頁65。
 - (24) 同上註。
 - (25)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於1992年成立，其前身為亞洲華文作家協會，於1980年在臺北成立，並於1984年3月創辦《亞洲華文作家雜誌》。